

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

萧 清 著



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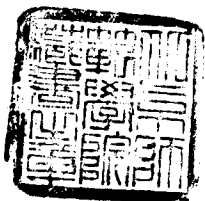
萧 清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11522

人 民 出 版 社



1111522



封面设计：倪天煦

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

ZHONGGUO GUDAI HUOBÌ SIXIANG SHI

萧清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5印张 263,000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400

书号11001·760 定价3.40元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先秦的货币思想	11
第一节 先秦货币思想的发生	11
第二节 单旗的货币子母相权论	15
第三节 先秦思想家的价值、价格观点	21
一、子贡的物以稀为贵论	22
二、范蠡的价格观点与平粜论	24
三、李悝的平籴论	27
四、墨家的价值和价格观点	28
五、孟轲与许行的价值、价格观点	35
第四节 《管子》的货币思想	39
一、《管子》关于货币的起源与本质的见解	40
二、《管子》重视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的思想	44
三、《管子》的货币数量论思想	48
四、《管子》关于货币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工具的思想	50
第二章 两汉的货币思想	59
第一节 西汉前期关于统一货币铸造权的争议	
贾谊、晁错、桑弘羊等的货币思想	59
一、贾谊的货币思想	60
二、贾山、晁错的王权论的货币思想	64
三、桑弘羊及其反对派“贤良、文学”的货币思想	67
第二节 西汉思想家对货币作用的对立看法 司马迁的	

货币自然发生说 贡禹的实物论思想	75
一、司马迁的货币思想	75
二、西汉中叶以后出现的实物论思想	80
第三节 东汉的货币思想	85
一、张林的货币数量论思想	85
二、刘陶反对铸大钱的议论	87
三、荀悦的货币思想	89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的货币思想	94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物论与反实物论的论争	94
一、桓玄等废钱用谷帛的主张	95
二、孔琳之等的反实物论的观点	98
第二节 鲁褒的《钱神论》	101
第三节 南北朝时期关于铸币贬损政策争论中货币名目主义与 金属主义的对立 反铸币贬损思想的发展	106
一、南朝沈演之、北朝高谦之的货币名目主义观点	107
二、南齐孔颀的反铸币贬损思想与他的《铸钱均货议》	108
三、南北朝货币议论中货币金属主义观点的发展	111
四、铜钱的自由铸造概念	112
第四章 唐及五代十国的货币思想	114
第一节 唐前期关于货币铸造权的争议 刘秩的货币思想	114
第二节 第五琦、刘晏的货币政策及有关货币思想	120
第三节 围绕两税法改革促成钱荒而发生的货币争议 中 唐思想家们的货币思想	125
一、两税法反对者关于钱荒问题的议论	125
二、中唐思想家陆贽、白居易、杨于陵等的货币思想 杜佑的货币思想及《通典》的贡献	129
第四节 晚唐及五代十国的货币思想	138

第五章 两宋的货币思想	143
第一节 宋人关于“钱荒”及铜钱外流的议论	
李觏、新法反对派、沈括的货币思想	143
一、李觏的货币思想	145
二、王安石新法反对派的货币观点	149
三、沈括的货币思想	154
第一节 周行己的货币思想 南宋人对于铜钱外流的看法	162
一、周行己的货币思想与北宋末崇、观年间的货币问题	162
二、南宋人对于铜钱外流及海外贸易的看法	171
第三节 宋代纸币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73
一、北宋人对于纸币的议论和看法	173
二、南宋初在东南推行交子的争议	178
三、杨万里的钱楮母子说与杨冠卿的钱楮实虚说	183
四、辛弃疾、吕祖谦、叶适的纸币观点	189
五、纸币的称提理论 袁夔、袁甫、陈耆卿论纸币	200
六、林珙、戴埴论纸币	208
第四节 宋元之际思想家许衡、马端临的货币思想	212
一、许衡的反纸币思想	212
二、马端临的货币思想	215
第六章 元代的货币思想	219
第一节 元前期关于中统钞的议论 王恽、卢世荣、 刘宣等的货币思想	219
一、统一的中统钞制度建立前耶律楚材等论纸币	219
二、王恽论元钞法 马亨的纸币观点	221
三、卢世荣的货币政策 刘宣、张之翰论钞法	224
第二节 叶李的钞币条划 郑介夫的货币思想	228
一、叶李的《至元宝钞通行条划》	228
二、有关纸币制度的几个货币范畴的发展	232

三、郑介夫的货币思想	234
第三节 元末关于至正钞改革的议论	
元明之际思想家的货币思想	239
一、元末封建统治集团关于至正钞改革的争论	239
二、王祚、刘基的货币思想	241
三、叶子奇论纸币	245
四、高则诚的《乌宝传》	247
第七章 明清的货币思想(上)	250
第一节 明前期关于纸币的议论 刘定之、邱浚的货币思想	253
一、陈瑛、夏原吉、范济论钞法	253
二、刘定之的货币思想	255
三、邱浚的货币思想	257
第二节 明中叶围绕铜钱问题的议论与重钱轻银思想	262
第三节 明末统治集团关于铸大钱和行钞的议论	
晚明思想家的货币思想	269
一、明末统治集团关于铸大钱和行钞的议论	269
二、李之藻、宋应星的货币思想	271
三、陈子龙、钱秉鐸的货币思想	274
第四节 明清之际关于“银荒”的议论 启蒙思想家	
及其他学者的货币思想	279
一、黄宗羲的货币思想	280
二、顾炎武的货币思想	282
三、王夫之的货币思想	285
四、唐甄的货币思想	290
五、关于行“银券”、“铜钞”的议论	292
第八章 明清的货币思想(下)	294
第五节 清代前、中期思想家的货币思想	294
一、王源、李塉的货币思想	295

二、靳辅、慕天颜、蓝鼎元的货币观点及海外贸易思想	298
三、关于钱贱、钱贵、私铸、私销及铜价问题的议论	302
四、郑板桥的货币观 清代反映货币拜物教思想的作品	305
第六节 鸦片战争前后关于白银外流与银荒的议论	
重要思想家的货币思想	308
一、林则徐的货币思想	309
二、魏源的货币思想	314
三、徐薰、孙鼎臣的货币思想	318
四、王夔的《钱币刍言》及其货币思想	320
五、包世臣的货币思想	332
六、《钱币论》与许楣、许梈的货币思想	338
七、王茂荫的货币思想	348
简结	359

绪 论

中国丰富的古代货币思想，是灿烂的古代货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前人遗留下来的宝贵历史遗产。

马克思说：“因为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由于希腊人有时也涉猎于这一领域，所以他们也和在其他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①早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之时，我国古代的货币思想已展示出绚丽的光彩，而且历代均有所前进，有所发展，对古代货币思想作出贡献的思想家也代不乏人，一直到十五、六世纪，在这一领域仍居于世界的前列。

春秋时期，单旗于周景王二十一年（前524）将“子母”这一组概念运用于阐述金属铸币流通，形成所谓“子母相权论”，这一货币理论曾为人们长期援引，用以解释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货币流通现象。主要出自战国学者们之手的《管子》，则把我国古代特有的、春秋以来已流行的“轻重”概念，广泛用于包括货币、价格、商品、贸易等人们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从封建国家的角度出发，把货币问题当作阐发的重点，遂使“轻重”概念在秦以后一、二千年中，基本上成为人们讨论货币问题的专有范畴，如南齐孔颢，唐代的刘秩、陆贽，北宋的周行己等就都曾应用轻重论来阐述当时的货币流通现象。

① 《反杜林论》第225页，人民出版社，1970年。

货币金属论与货币名目论这两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货币本质问题看法的基本派别，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思想中，也已有明显的表现。单旗的子母相权论就是最早立足于货币金属论、为反对周景王铸大钱而阐发的。《管子》重视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的思想，及它的关于货币无补于饥寒的看法，则是立足于货币名目论，而且以此为基点，形成关于货币是封建国家干预经济的工具的思想。除此，《管子》还最早在轻重论的基础上，阐发了“物多则贱，寡则贵”的货币数量论思想。

此外，在价值论方面，《墨子》提出“为屨（鞋）以买不为屨”，“买，刀（铜币）粟（谷物）相为贾（价）”的命题。《墨经》的作者已发现物品用途的二重性，即已接触到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问题，并看到物品自身不能表现价值，而必须借助另一物品来表现，亦即已接触到价值形态及其表现的问题。可惜，墨家这些对科学的价值论至关重要的思想，在我国其后历史的漫长年代中并没有获得很好的发展与延续。

在秦汉地主经济制统一封建帝国建立后的二千年中，西汉前期的思想家们在货币思想领域方面，积极为巩固统一的封建地主经济制政权、为建立统一的货币制度作出了重要的舆论准备。贾谊（前200—前168）提出了“法钱”的概念，尤其是他的“禁铜七福”论，要求由封建政府垄断币材——铜的主张，对后来封建国家的货币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贾山和晁错（前？—前154）发展了《管子》关于货币无补于饥寒的名目论思想和国家把货币作为干预经济的工具的思想，认为货币本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无用之物，但封建君权则可使它成为“易富贵”、“无饥寒之患”的东西，明确强调了掌握货币铸造权与维护君权二者联系的重要性。桑弘羊（前152—前80）是汉武帝实现垄断货币铸造权、建立统

一五铢钱制度的主要执行人。他在《盐铁会议》上坚决维护中央垄断货币铸造权的政策，坚定地说：“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于是，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统一”概念，而为统一的封建帝国树立健全的货币制度确定了一项重要原则。除此，他还最早的把“虚实”这一组概念用于解释商品与货币二者的关系上。他说：“以末易其本，以虚（货币）荡其实（商品）”，是为我国又一专有的货币理论——货币虚实论的发轫。后来，北宋的周行己又更清楚地阐述这一概念说：“盖钱以无用为用，物以有用为用，是物为实而钱为虚也。”

货币铸造权的集中与统一的原则，经过两汉思想家的鼓吹与激烈争辩，这一问题在历史上遂获得了较好的解决。在此以后，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对于铸币权由封建国家统一的原则，基本上就未再有大的争论。

在我国封建地主经济制前期，自然经济毕竟有很大的优势，因而在货币经济发展的同时，从西汉中叶以后，就一直不断出现“实物论”思想。贡禹（前120—前44）是发出废钱用谷帛主张的最早的代表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货币的混乱，经济实物化状态的增强，则更多地可以听到这一呼声。然而这一时期，维护金属铸币流通的“反实物论”思想，以及反对铸币贬损的货币金属论思想也同时发展了。前者可以反对桓玄（363—404）废钱用谷帛建议的孔琳之为代表。他在对币材自然属性的分析上，有说服力地揭示了金属货币对谷帛的优越性；而南齐孔颉的《铸钱均货议》则是阐发货币金属论、维护足值货币、反对封建统治者铸币贬损政策的一篇带有代表性的文章。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在货币经济受到重大损害、经济实物化增强的时期，却出现了突出反映人们货币拜物教思想的鲁褒的

《钱神论》。马克思很是欣赏莎士比亚（1564—1616）的《雅典的泰门》中对作为货币的黄金权力的描述，认为“莎士比亚把货币的本质描绘得十分出色”^①。可是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比鲁褒的《钱神论》却迟了一千多年；它与后来我国另一以纸币为主题的揭露人们货币拜物教思想的作品——南曲大家高则诚（1310—1380）的《乌宝传》相比，虽同是大戏剧家的作品，但也是晚了二百多年。

在我国封建地主经济制后期，由于商品货币关系和金属铸币流通的发展，尤其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纸币产生及其流通的事实，因而促使货币思想又有所前进和发展。

唐代的刘秩（？—756）祖述《管子》和贾谊的成说，持论平正地维护了封建国家垄断铜币铸造权的原则，并在议论中将贾谊以重农抑末思想为主导的禁铜“七福”，发展为包括照顾商人利益“末利”的禁铜“四美”论。他还运用《管子》轻重论更进一步地发展了货币数量论思想。他说：“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于钱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这里，他将货币价值的大小，与货币数量的多寡直接联系起来，因而比较东汉张林、南齐孔颢所言“钱少物皆贱”、“余不贵是天下钱少”，将物价高下与货币数量多寡相联系的说法，就更为前进了一步。在此以后，在中唐“钱荒”问题的争论中，陆贽（754—805）也运用轻重论把对货币数量论的认识概括为“物贱由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陆贽和刘秩的说法，都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表述最为清楚的典型的货币数量论。

北宋的沈括（1031—1095）是我国十一世纪的博学多才的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第15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

学家和思想家，他在货币思想方面也有卓越的贡献。他在对宋代“钱荒”问题的议论中，提出以贵金属金银为币、利用类似信用货币作用的盐钞代行货币职能的主张。尤其是他对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数量关系的认识，是最有见地的了。他说：“钱利于流借。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殍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这就使他对前人反对货币“壅积”的思想有了重要的发展，并最早的提出货币流通速度的概念。周行己（1067—？）也主张改善和推行纸币“交子”及茶、盐钞引、公据等信用凭证和证券，并将轻重理论运用于铜、铁钱流通上，以解决当时货币流通紊乱和币值不稳的问题。而在货币思想方面最值得注意的，即他所云：“钱本无重轻，而物为之重轻”，“钱与物本无重轻，……而相形乃为轻重”的观点，以及他重视钱与物“相为等而轻重自均”的看法，即他重视货币与商品间的等一性。这样，虽然“他不能发现这个均等关系‘实际上’是由什么构成”^①，但毕竟是使轻重理论与科学的价值论联系或接近了。

进入宋代，约在十世纪末，我国货币流通界出现了纸币这一崭新事物。纸币在我国封建社会中较早的产生及其流通，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因而宋元时期的思想家和学者们围绕纸币问题阐发的议论，又更丰富了我国古代的货币思想。

从货币流通的理论范畴的发展看，由于纸币的出现，“子母相权”这一概念的含义也随之发生变化，而且还把“虚实”与“子母”这两对范畴结合起来，使得古老的“子母相权”货币论的内涵更为丰富了。本来，所谓“子母相权”是指金属铸币流通中、两种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33页，郭、王译本，人民出版社。

单位大小不同的重钱、轻钱并行流通的关系。后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铸币贬值及虚价大钱的流通，于是“子母相权”概念，又被援用于足值、不足值金属铸币的并行流通关系上，如唐代第五琦主管财政，于乾元元年（758）铸造当十“乾元重宝”大钱，与足值的“开元通宝”钱并行，也就被说是“小大兼适，母子相权”。纸币产生以后，则又被援用于金属货币与纸币之间的关系，如南宋杨万里（1124—1206）提出钱楮母子说，认为江南之铜钱，淮上之铁钱为“母”，行在会子，铁钱会子为“子”，“母子不相离，然后钱、会（会子）相为用。”陈耆卿（1177—1234）也说：“钱（铜币）犹母也，楮（纸）犹子也，母子所以相权。”除此，人们还将“虚实”与“子母”结合用于说明货币流通现象，所谓“实”，指足值的金属货币，“虚”指不足值的虚价铜币及纸币，尤其是贬值了的纸币。铜钱之有“实钱”、“虚钱”之分，始于唐代第五琦之铸造乾元大钱的贬值流通，于是使“虚实”概念相应地从商品与货币间的关系而扩及于货币流通界内部不同种类或性质的货币间的关系。纸币广泛流通以后，从南宋时起，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便普遍以铜钱为“实”、纸币为“虚”了。杨冠卿（1139—？）率先提出“楮，虚也”、“钱，实也”的钱楮实虚说，叶适（1150—1223）也称纸币为“虚券”，袁甫则把铜钱与纸币的兑换，称为“以实钱博虚会（会子）”。元人承袭金人的“交钞”制度，把纸币叫做“钞”，最初分散发行地方性纸币时，有所谓“银钞相权法”。元朝建立以后，于中统二年（1261）开始发行以银为本的“中统元宝交钞”，当时王恽（1228—1304）就将这一纸币发行制度称为“使子母相权，准平物估”，而赵孟頫（1254—1322）则将这一情形说是“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因而“虚实”与“子母”概念已结合起来，而且它们的内容发展为白银与纸币的相权关系了。

在纸币流通的情形下，纸币流通的稳定，与国家经济、财政及各阶级人民生活的关系密切相关，因而怎样保持纸币稳定的问题，也就是朝野人士皆所关心之事。人们强调“子母相权”、“虚实相权”的原则，大凡皆与要求纸币兑现，以保证纸币币值的稳定相联系，而怎样利用包括兑现等措施、使纸币币值保持稳定的理论和办法，就是所谓“称提理论”或“称提之术”——这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纸币流通下所独有的另一重要货币范畴和理论。

“称提”一词，是始自宋代的一个货币术语，按其本意有权衡之意，推广言之，也有对纸币制度与纸币流通管理的意思。其内容，主要是指用金属货币或实物（钱、银、绢等）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从而使贬值的纸币得以恢复其原来的名义价值；或把已贬值的纸币币值提高并稳定下来，使纸币价值在一个新的水平上与物价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关系。纸币称提的方法，与盐钞的“置场买卖”在原则上也是类似的。由于最初的纸币“交子”本来就是可以兑现的信用货币，因而通过兑现以保证纸币价值的稳定，人们早已懂得了。如北宋的皮公弼就说：“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然不积本钱，亦不能以空文行。”至于纸币称提原则与方法的理论出发点，则是纸币“少则重，多则轻”这一人所习知的货币数量理论。在这方面，袁燮（1144—1224）就指出：“楮之为物也，多则贱，少则贵，收之则贵矣；贱则壅，贵则通，收之则通矣。”他的次子袁甫也认为纸币“收愈多则数愈少，数愈少则价愈昂”。戴埴则言：“予谓钱与楮犹权衡也，有轻重则有低昂，分毫之力不与焉。……故言楮则曰称提，所以见有是楮，必有是钱，以称提之也。楮多易得，则金钱贵重，……楮愈多则物愈贵。”货币数量论用于自身有价值的金属货币是不对的，但是作为金属货币符号的纸币，它的价值的大小，却正是直接决定于流通中的纸币数量

的多少。因而，人们从纸币流通的实践中所得出的纸币“少则重，多则轻”这个结论是符合实际的，虽然人们还并不懂得，不论纸币数量的多少，它所能代表的价值，只能是流通所必需的真实货币的价值这一纸币价值形成的原理。

在宋元时期长期纸币流通的实践中，人们对纸币及其规律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如元明之际的叶子奇（？—1378）论述纸币制度时就说：“必也欲立钞法，须是钱货为之本，如盐之有引，茶之有引，引至而茶、盐立得，使钞法如此，乌有不行之患哉！……譬之池水，所入之沟与所出之沟相等，则一池之水，动荡流通，而血脉常活也。借使所入之沟常通，所出之沟常塞，则水死而不动，惟有涨满浸淫，而有滥觞之患矣。”叶子奇是不赞成不兑换纸币流通的，因而也就不能理解强制通用的不兑换政府纸币的本质，然而他对不兑换纸币进入流通、不能自动退出的特点的观察是很深入的。于是我们能够看到，他已意识到纸币代替金属货币流通，必须保持在一个客观的适当数量的水平上，当纸币不能兑现时，就无异堵塞了池水发泄的渠道，从而也就随时有纸币数量超过客观限量，而不免有水满浸淫之患。马克思曾用“蓄水池”比喻“贮藏货币”对流通中货币的影响说：“贮藏货币表现为流通中货币的引水渠与泄水沟”，^①所以，与此相似，叶子奇所言保持纸币正常流通的“池水动荡，血脉常活”的比喻，也的确应是一个很可赞许的形象说法。

所以，我国封建社会中长达数百年的纸币流通的实践，大为充实和丰富了我国古代货币思想的内容，就世界范围看，由于纸币在我国出现得最早，因而我国古代思想家关于纸币方面的理论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00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

和见解，也就更是弥足珍贵的了。

可是长期受封建统治者纸币膨胀之害的古代人民，是不可能弄清纸币流通与通货膨胀两个范畴间的区别与联系的，因而就使多数人均对纸币持否定、甚至敌视的态度，一些思想家也往往对纸币贬值的弊害，归咎于纸币制度本身。许衡（1209—1281）就认为“楮币之折阅，断无可称提之理”，并把贬值的纸币，径直说是封建政府对人民的负债，斥责为“无义为甚！”而元朝末年的民谣把“人吃人”，“钞买钞”与“贼做官、官做贼”相比，则更是对封建统治者滥发纸币、剥削人民行为的一针见血的鞭挞。

进入明清时期，在货币思想领域作出值得称许的贡献的，是十五世纪的思想家邱浚（1420—1495）。他在对于纸币理论的阐述中说：“所谓钞者，所值之费不过三、五钱，而售人千钱之物。呜呼！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深浅，其价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钱，其体非大则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钱而售之，可不可乎？”这里的“物”，应指劳动生产物而言，因为它是“资以人力”而“成其用”的，即它的使用价值是靠人的劳动而产生的，而作为商品的“物”的价值大小，则决定于“功力”的深浅，即耗费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的多少。这样，他在阐述货币与纸币问题时，便开始接触到商品的劳动价值观点，这也正是他在货币思想方面较前人进步之处。

然而就明清时期货币思想总的状况看，却呈现出发展迟滞的情形，这尤其表现在明清之际人们关于“银荒”问题的议论中。其时已是十七世纪，贵金属白银也早已发展为流通中的主要通用货币，国内封建经济中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当时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如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2）、王夫